

# 企业年检制度将取消 杭州企业老板纷纷叫好

■ 洪慧敏

工商总局近日发布的消息称,自今年3月1日起,将停止对领取营业执照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及其他经营单位的企业年检工作。

工商总局要求,各级工商部门应抓紧做好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实施准备工作;结合本地企业和经济发展实际,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依法查处各类违反企业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根据国务院新近出台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年报公示制度;改革个体工商户验照制度,建立符合个体工商户特点的年度报告制度;探索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制度。去年12月,工商总局已发文明令暂停了个体工商户验照工作。

## 企业年检制度实行了20多年

据今日早报道,企业年检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近日,记者进入浙江省工商局的官网,查到了一份2012年度企业年检的公告。

根据这份公告显示,“企业参加年检的时间为2013年3月1日至6月30日;企业要



登录相关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填写年检资料,经工商部门网上预审核后,再根据年检规定及工商部门预审核反馈意见的要求正式报送书面年检材料。企业应当提交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企业范围。”

这份公告显示,“如果企业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工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拒不接受年检的将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记者采访了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介绍,企业年检制度迄今已经实行了20多年。“通过企业年检,工商部门每年进行定期检查。通过监督检查,来规范企业的行为。”



### 杭州一些企业为“免检”叫好

取消年检,企业怎么看?

“对企业来说,肯定是好事情。在这次改革中,取消企业年检,是简化审批流程的重要举措。”近日,祐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天荣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手称赞。

在戴天荣等杭城企业老板看来,原有的企业年检制度,费时、费力、费钱。特别是对小微企业来说,更是蛮麻烦的事情。

一些杭城企业老板认为,取消企业年检,不但将减少有形的费用,更能提高无形的效

率,激起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情。

## 浙江拟于月底建成企业年报申报平台

未来,企业年检取消后,工商部门将如何监督企业?省工商局的这位负责人介绍,以后企业将采取年报方式。

何为年报?也就是说,省工商局建立一个“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由企业自行把登记情况、取得国家相关部门许可的资质证书、资产状况、资本等信息,一一进行报告,并直接对社会公示。

目前,省工商局已经做好了准备,2月底计划完成企业年报的申报平台。

“相比年检,年报不需要企业直接跑工商部门上缴材料,对企业来说可能更方便一些;年检是监督检查,年报则是一种社会公示行为。”这位负责人分析。

未来,虽然不再实行企业年检制度了,但企业也要同样重视“年报”。省工商局表示,如果企业不登记年报的话,会显示其经营异常。3年不报告的企业,可能列入“黑名单”。

不过,浙江企业如果不做“年报”,工商部门能不能对其处以罚款,乃至实施吊销营业执照等措施,目前尚不明确。

“年报代替年检,这对促进企业的自律、诚信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戴天荣等企业家这样告诉记者。

# 冯仑吐苦水:地产商是穷人

■ 房报

在最近举办的“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上,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医健联盟主席冯仑大吐苦水:地产商是穷人,是手艺人。

“地产商不是有钱人,大家一定要记住,地产商是穷人,是手艺人。你去看看曼哈顿的楼,地产商的还不到1/5;陆家嘴30栋楼,50%不是地产商的,都是金融机构的。楼越多的地方,地产商都是给人干活的,所有楼都是地产商盖的,专业都是地产商干的,但是业主不是地产商。所以我们盖的房子升值,但没有钱,我们只是有手艺的人,所以我们跟索康他们有钱人合作,他们是投资商,我们是开发商。”

# 贺铿谈经济: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三大问题

■ 王浩

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日举行的经济每月谈上,经济学家贺铿认为,中国经济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想办法真正扩大内需,扩内需不能总是跟投资混在一起,内需主要是指居民消费需求。多年来居民消费不旺,扩内需扩不起来,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少。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2.5%,下降到现在的46%,全世界平均是60%。要增加居民收入,贺铿提出要“大企业让利、小企业减负”,大企业让利,主要是国有垄断企业让利,石油、电力、银行放出来的信息都是亏损,亚布力论坛上,国有企业家都在叫苦,但实在是不能听他们的,他们必须要让利。到2020年,国有资本上交公共财政要提高到



30%,我觉得今年就要开始做这个事情,国有银行、石化、移动、电力对公共财政的上缴,数字小的可怜。国企高管可能会叫苦,但贺铿认为,“不让利,就让位”,“中国找你这样一个高管,还是找得到的,没有硬手段,那就是百姓不满、国家不好办”。

第二个问题,是要尽快对影子银行“去影子”,降低金融风险,降低小企业融资成本。但是,一些民间金融机构,比如P2P,这

种形式是打破商业银行垄断的希望所在,他们促进了利率的市场化,解决了小微企业的困难,应该保护引导,当然也要监管,不要一说“去影子”,就把这些创新弄得灰头土脸。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给小微企业减压。一是结构性减税;二是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收费,对于中小企业压力很大,这个要进一步清理,减税、减费今年是关键。小企业活起来,就业、消费就有很大的把握。

# 王石真与伪:企业家称佩服其敢被人贴身拍三年

■ 孙乐涛

“我最佩服王石的是他敢让人拍三年,如果有人拍我三年,我会疯掉。”2008年起,深圳一家纪录片公司曾贴身更拍王石三年,积累了10万分钟的影像资料。一位企业家闻知此事,发出如上感慨。

## “名教中人”

据时代周报报道,在当代中国企业家中,王石确实是个另类。他作为“商人”,给人们的印象是几乎“逐名”甚于“逐利”。他基本上不是作为老板,股东,而是作为职业经理人领导了万科多年。作为经理人,自然获利有限,远离富豪榜。关于自己为何取名舍利,王石在媒体访谈、演讲著述中已讲过无数次。原因林林总总,与万科国企改革背景有关,当然主要还是王石自己的选择。这方面冯仑在《野蛮生长》中的总结比王石自己说的简练直白:王石很早就意识到,在中国,名利兼收非常危险,“若是不甘寂寞,那就得舍名取利。如果他是个富豪,同时又爱张扬,那万科就会有问题,肯定活不到现在。”王石确实“不甘寂寞”、“又爱张扬”,“闷声发大财”不是他的菜。况且,他在聚光灯下的天文又是那么好。

好名而弃利,王石的身份看起来错位,以商人身份追求儒生的价值。但翻阅王石的众多著述,确实可以清晰地看到,王石是一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与素养的企业家。他大谈科学、理性,大谈修齐治平,其实并不突兀。吴晓波为王石新书《大道当然》作序,以一段“煽情”文字结尾:“在南方小镇深圳,这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然后,他醒来,行走,挣扎,一路远足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确定。”王石,虽然“少时贫寒”,“青春荒芜”,但无论从出身、还是去深圳创业前的经历来看,他都是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精英阶层”的一员。在这一点上,王石同比他晚一些下海的“92派”企业家非常类似。92派,大多是那个年代稀有的名牌大学生,天之骄子,毕业后混迹于省部级国家机关、科研院所等,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

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文化传统,在晚清、民国时期遭到严重冲击,随着当时市场经济的逐步实现,甚至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了。但上世纪50年代起政治重新集权化,计划经济大



一统之后,这个传统等级秩序很大程度上又复活了,只是“干部”这个新的精英等级代替了传统士大夫。92派人士,这些“国家干部”下海经商,一开始实际上并不具有纯粹的商人意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与文化抱负下海的。如92派的代表人物陈东升就曾自述,80年代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策划“中国企业500强”评选活动后,他意识到:“什么科技救国、教育救国,都是虚言,只有实业救国一途,拥有多少跨国公司才是屹立于世界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没有经济,就没有一切。”

如“92派”这一代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精英分子,即使做了成功的商人,单纯的金钱与私人生活享受也难以满足他们,他们往往“忧国忧民”,追求“大我”,喜好宏大叙事,乐于介入公共生活,影响公众。这在一方面可以褒扬为有崇高的公共精神、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是潜存在他们身上的旧意识形态的本能反应,背后有政治权力弥散与个体意识匮乏的阴影。

与92派类似,读《大卫科波菲尔》、汤因比《历史研究》以及马克思韦伯的王石,他以后的所作所为,也无法褪去时代与身份的烙印。甚至,他比92派那些人走得更远。

界,学习西方,长江漂流,穿越罗布泊,神农架找野人,特异功能人,春晚留学生祝福祖国,这就是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即使在多年后名满天下的王石身上,我们仍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印记,那个时代的渴望。

一个精致的1980年代弄潮儿,青春不再骚动,他渐渐进化出布尔乔亚范儿,他是启蒙企业家,企业界的胡适之,一代名士,他没有“原罪”,他是万人瞩目的国民偶像。平心而论,当年王石把本应分得的40%的万科股份归公,确实是非同一般的魄力,非有强大的自律能力不能为之。取名弃利,如此决绝,命运之神也该对他万般眷顾。好名近伪,大奸似忠,名教中人向来难免这种非议。镜鉴。以商人身份做名教中人,名声好到要“贴墙上”的王石,自然也难免这样的质疑。

## “西化派”王石

王石的商业观念,也带有深深的1980年代启蒙主义的印记。在中国当代企业家中,他是不多见的表明坚定立场的“西化派”。

在万科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王石津津乐道的得意之作。王石理解的“现代企业制度”,其背后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对立,而从文化意义上理解人治与法治,则是中国与西方的对立。这个简单化的理论框架是80年代启蒙思潮的基本共识。

在王石看来,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法治与契约精神之上的,基于契约精神的信任关系,使商业交往摆脱了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可以大规模扩展、高效率运行,企业也得以摆脱家族化的局限,成为依法治理的现代公司。而这种支撑现代企业制度的契约精神,与基督教有相当深厚的渊源关系。王石多次表示,万科的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他对韦伯讲的清教伦理十分倾慕,对洛克菲勒身上表现出的清教精神赞赏不已:“如果必须选择一个宗教的话,我会选择基督教。”

对传统文化、“国学复兴”,他则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提倡“拿来主义”:“既然是西方来的,那我们就彻底地拿来就好,不要爱面子还要讲洋为中用。”为什么“洋为中用”不好?“中国传统文化原本是模糊的,讲究点到为止,不讲规则,强调讲仁、义,讲人治,这与西方规范、透明的原则从根本上是相悖的”,两个相悖的东西绑在一起,不但不能如虎添翼,反而

捆住了手脚。这些说法,王石多年来都在不断地讲。

哈佛归来,王石声称:“不要说中国企业,就是和一些跨国企业比,万科在中国的企业也更西方化。”“西方化”的结果就是王石非常得意的万科的经理人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这种文化“规范不权谋”的说法:“权谋的特性是不限于规则,发展至极甚至藐视规则,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因而,他表示反感《鬼谷子》、《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中的权谋思想。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经理人文化,在企业中他标榜“六亲不认”:“至今,在万科没有我的亲戚,没有我的大学同学,没有我的部队战友,没有我的儿时玩伴,没有我在广州的旧同事。”

王石“不行贿”的说法,听起来颇有些不食烟火的味道,历来质疑之声很多,而且一旦质疑马上会卷入对他的身份、背景的“起底”。但万科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上市公司,其治理结构,透明度应该说是很优异的。万科发源于南方,在南方城市圈也做得比较好,在北方则大为逊色,这大概得益于南方的市场化程度、规范化程度较高,王石也说,“万科比较适合南方文化。”

任志强对万科、对王石一直颇有微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花很大篇幅,讲述自己与万科的“梁子”,读来颇有意思。任志强标榜的华远文化与王石标榜的万科文化恰成对照:王石讲“六亲不认”,任志强则大谈华远的“家文化”;万科一度清华北大学生不管什么专业来者不拒,任志强则对清华学生十分反感,“不招清华毕业的”;王石宣称不搞“洋为中用”,任志强的“华远哲学”则“结合论”比比皆是;王石津津乐道“经理人文化”,而任志强对万科的“职业经理人”的藐视跃然纸上。

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王石向来不客气。不久前他谈到王石哈佛归来之“变”,大意是王石的微博,以前全是花草草,但如今也敢批评一下有司了。

布尔乔亚范的王石,或许让人想起“精致的利己主义”一词。适时调整颜色,在有司和民众之间拿捏好分寸,利益最大化……说法挺多。诛心之论带来负面情绪,或许并不厚道,还是来点正能量吧。毕竟,好名之徒,顶多有时让人怀疑,让人生厌,而藐视名教,和尚打伞,则可能成奸成大恶。清初理学家魏象枢说得不错,“好名是学者病,是不学者药。”

# 2014 真正的问题是“三高”

■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尽管有改革红利释放、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等有利因素,但受利率高、汇率高、负债率高“三高”问题的负面冲击,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

对于2014年的中国经济增速,我们的预测是7.6%。我们看到一些有利的因素,例如今年会是改革的一年,大家都认为形势会比过去好一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后面的“三高”负面因素,即偏高的利率、汇率和政府负债率。这“三高”将会压倒前面的有利因素,所以整体而言,2014年的经济相对2013年有下降的可能。

我们一讲起改革就想起“春天的故事”。我们也看到这次三中全会的部署的确是全面的改革,正因为是一个全面的部署,所以改革的难度很大,三中全会的改革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完的改革。放在2014年这一年来讲,恐怕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马上去做,很多事情做了,在2014年还不能完全发挥出对经济增长正面的贡献率。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想到,因为它是改革的第一年,所以2014年就会有“春天的故事”,那么强劲的推动。

有人会问,中国经济转型,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曙光?其实,我认为,转型这个词在中国的目前含义已经被泛化了。你讲的转型跟他讲的转型可能大家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恰恰因为大家想要的东西五花八门,最终居然都在这两个字上达成一致。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结构问题是一个彼岸吗?不是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结构动态持续的过程,不是说从这个点跳到那个点。既然如此,有谁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最合适的?显然不是政府,而是市场。从这次三中全会的改革来讲,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新变化就是发挥市场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之路都是任重而道远。但是改革的确是一服培本固元的药。

另外,从过去10多年来看,一般美国的经济比较好,中国的出口比较好,前提是它的经济增长。但是,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GDP环比这么强劲增长的背后最主要的动力是投资,不是消费。即便是消费,我们也注意到,从2011年之后,美国消费的上升跟中国出口的回升并不是等幅的,这个跟过去10年的状况完全不一样。而这种情况,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也出现过,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东西放在全球太贵了。我们发现在国外西方买回来的什么东西都比国内便宜,这样一来,中国的东西还会有竞争力吗?过去好的故事在今年很难变成现实。

其实,今年真正的问题是“三高”。高利率。2013年从6月份开始,由货币市场利率所推动的各个利率品种权限的上升,发展到第四季度,我们看到,除了国债,所有各个品种的利率都已经达到了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现在,最聪明的企业家都立刻关门,直接放高利贷。因为办企业还不如放高利贷挣钱多,这就是高利率造成的问题。

高汇率问题。当前尽管用CPI购买力平价算人民币汇率仍然是低估的,但是如果用劳动力的成本去算,人民币汇率毫无疑问是被高估的,而后者无疑与外贸企业关系更密切;现在从银行的坏账层面来看,坏账最严重的都是过去出口导向地方,都是依靠贸易比较高的制造业地区。

而就地方债规模而言,尽管风险可控,但如果在2014年内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控制,将对经济增长有下行的压力。他们如果不投资,将不会看到2013年下半年经济的反弹。

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出口难享复苏,投资缺乏支撑,而经济持续低位运行,消费也很难继续上升。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8年起几乎是节节下调,我们现在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支撑它在2014年能够继续上升。

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放在今年来看,高利率、高汇率和偏高的政府负债率这“三高”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头上悬着的剑。

(注:本文由《小康·财智》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国药准字H46020636

**快克**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请在医生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海南快克药业总经销